

The Latin American Integral/Integrado Museum as a “Consciousness-Oriented” Social Institution

Wenhao Gu

China Academy of Art, Hangzhou, Zhejiang, 31002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practice models, and profound intellectual legacy of the “Integral Museum” (Museo Integral/Integrado) movement in Latin America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n response to the epistemological crisis triggered by traditional museums acting as bastions of Eurocentrism and coloniality, the 1972 Round Table of Santiago marked the birth of Latin American “Social Museology.” This movement dismantled traditional disciplinary and spatial boundaries, reconfiguring the museum from a singular “temple” of artifact collection into a social apparatus aimed at intervening in social reality and serv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corporating the practice of the “House of the Museum” (Casa del Museo),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Integral Museum is not merely the pursuit of functional synthesis or spatial expansion. Rather, drawing on Paulo Freire’s concepts of “problem-posing education” and “conscientization,” and deeply echoing Karl Marx’s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l man” (ein totaler Mensch), it is dedicated to generating the “integral subject” through continuous social practice and dialogue. Transcending the mere improvement of exhibition techniques, this movement represents a profound revolution aimed at restructuring the topography of knowledge and power and resisting the alienating logic of Western-centrism. It offers objectified marginalized groups, such a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urban poor, the political possibility to re-enter history and achieve “re-humanization.”

Keywords

integral museum; social museology; integral subject; conscientization

作为“意识化”社会装置的拉美整全博物馆

顾文浩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浙江 杭州 310024

摘要

本文探讨了20世纪下半叶拉丁美洲“整全博物馆”（Museo Integral）运动的兴起背景、实践模式及其深远的思想遗产。面对传统博物馆作为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性堡垒所引发的认识论危机，1972年圣地亚哥圆桌会议标志着拉美“社会博物馆学”的诞生。该运动打破了传统的学科与空间边界，将博物馆从单一的文物收藏“圣殿”重构为干预社会现实、服务社区发展的社会装置。结合“博物馆之家”实践，文章指出，整全博物馆的实质并非单纯追求功能的综合或尺度的扩张，而是依托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提问式教育”与“意识化”理念，并深层呼应马克思关于“整全的人”的哲学探讨，致力于在持续的社会实践与对话中生成“整全主体”。这场运动超越了展陈技术的改良，是一场旨在重构知识权力地形、抵抗西方中心异化逻辑的深刻革命，它为被客体化的边缘群体（如原住民、城市贫民）提供了重返历史并实现“再人化”的政治可能。

关键词

整全博物馆；社会博物馆学；整全主体；意识化

1 引言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博物馆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危机。长期以来，拉丁美洲的博物馆不仅是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文化飞地，更是殖民性（coloniality）在美学与历史叙事上的顽固堡垒。传统的“缪斯神庙”模式将文物从其原本的社会、生态与精神语境中剥

离，将其神圣化为玻璃柜中的“物”，而创造这些“物”的主体——原住民、农民、城市贫民——则被客体化为沉默的被观察者。

正是在这种历史困境之中，拉丁美洲的博物馆人开始意识到，问题并非仅在于展陈方式的改良，而在于知识权力结构本身的重构。而其中“整全博物馆”的提出，正是对这种殖民性结构的回应——它试图重新召回被客体化的主体，将社区、劳动与日常生活重新纳入博物馆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而在制度层面展开对西方中心主义异化逻辑的抵抗。

【作者简介】顾文浩（2000-），男，中国江苏无锡人，在读硕士，从事博物馆策展与展示研究、内容性生产平台研究。

2 整全博物馆：抵抗西方中心异化的拉美自觉

1972年5月20日至31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主持的“当今世界博物馆的角色与发展圆桌会议”（Round Table on the Role of Museums in the Modern World）在智利圣地亚哥召开。这次会议被公认为拉丁美洲“社会博物馆学”（Social Museology）的诞生时刻，也是全球“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运动的前奏。会议召开的时空背景极具象征意义。彼时的智利正处于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总统领导的社会主义实验中，整个社会弥漫着关于结构性变革、土地改革与民众参与的激烈讨论。与此同时，整个拉丁美洲正深陷于城市化激增、农村凋敝、贫富悬殊扩大以及科技鸿沟加剧的“发展危机”之中。

不同于以往仅由馆长和艺术史学家参与的行业聚会，圣地亚哥圆桌会议展现出了一种激进的跨学科性。与会者不仅包括博物馆学家（如墨西哥的马里奥·巴斯克斯 Mario Vázquez、智利的格雷特·莫斯特尼 Grete Mostny、法国的于格·德·瓦琳 Hugues de Varine），还前所未有地引入了农学家、城市规划师、社会学家和教育专家。这种人员构成的异质性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博物馆的问题不再仅仅是文物保护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的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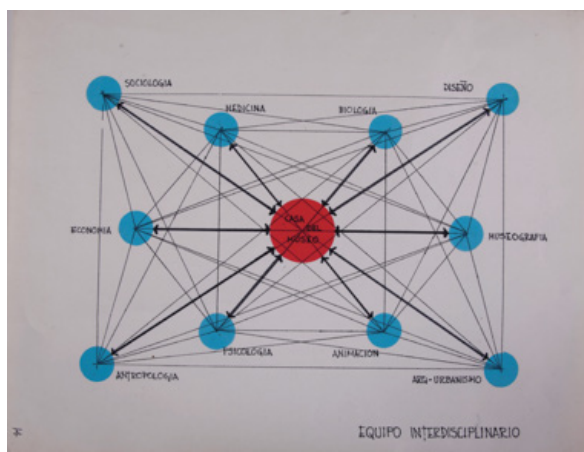


图1 博物馆之家项目的跨学科团队，
© 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历史档案馆

会议的核心成果是《圣地亚哥宣言》（Declaration of Santiago），该文件提出了一个新的博物馆定义，即“整全博物馆”。根据《圣地亚哥宣言》，这种新博物馆必须是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其功能不仅仅是收藏和展示，更是“构成社区意识的一个不可剥夺的部分”。

在《圣地亚哥宣言》原文中，“Integral”（全面/整体）与“Integrado”（综合）的使用存在清晰的层级分野。当提及“Museo Integral”时，原文语境侧重于宏观的视角与总体方针，旨在促使社区全面认知其自然与文化环境；而当提及“Museo Integrado”时，语境则转向跨学科的综合处理与运作机制，如利用博物馆资源在城乡设立展览、以具体项目

回应当代社会问题。由此可见，这两个词汇指向不同的实践层级：“Integral”确立了理念上的“总”，而“Integrado”落实了方法与实践上的“分”，两者内外相济，共同构成了“整全博物馆”的完整内涵。

格雷特·莫斯特尼（Grete Mostny）在会议总结中指出，面对拉丁美洲不发达、不公正和受压迫的现实，博物馆不仅要反映现实，更要成为“逆转这些情况并促进社会整体福祉的代理人”。圣地亚哥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极具颠覆性的决议，如向社会科学与技术开放、关注城乡二元结构、终身教育与意识化、建立拉丁美洲博物馆学协会（ALAM），这些决议构成了日后拉美社会博物馆学的基石，标志着拉丁美洲博物馆学在认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一次根本性转向：打破以艺术史与考古学为核心的传统学科边界，将知识的合法性从“历史久远性”与“审美价值”转移至其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解释力与干预能力，以及赋予博物馆主体生成与社会行动的政治维度。

3 博物馆之家：整全博物馆运动的一次实践



图2 嵌入社区的博物馆之家
呈现为橙色钢板外墙，红色屋顶的六边形建筑
© 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历史档案馆

“博物馆之家”是圣地亚哥圆桌会议精神最直接的产物，也是“整全博物馆”理念的一次实践。该项目由会议的协调员马里奥·巴斯克斯（Mario Vázquez Ruvalcaba）在墨西哥城发起。面对宏伟的国家人类学博物馆（MNA）与周边贫民窟（如塔库巴亚区 Tacubaya）之间的巨大鸿沟，巴斯克斯决定实行“破墙”策略。该项目不是建立一个分馆，而是建立一个灵活的、嵌入社区的空间（往往是租用的普通民居或临时建筑）（图2.2）。在展览开始前，博物馆团队（包括人类学家、教育家）会先在社区居住，进行参与式观察，寻找弗莱雷所说的“生成性主题”。展览的主题比如“水资源”、“寄生虫防治”、“住房产权合法化”和“营养”，并与居民一同共建，博物馆成为了社区解决生存问题的资源中心。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该项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女性专业人员（如 Miriam Arroyo, Coral Ordoñez）和社区妇女的日常互动。这种“女性调性”（feminine key）

的实践模式，建立了一种基于关怀和信任的关系网络，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父权制的专家权威。巴斯克斯曾形象地描述该项目最终被社区“吃掉”了——即博物馆完全融入了社区的有机体中，失去了其作为独立机构的边界。这正是整体博物馆的最高境界：机构的消亡与生活的复兴。它证明了博物馆可以成为城市边缘群体争取“城市权”（Right to the City）的政治工具。

4 整全博物馆的整全性思想遗产

由此可见，拉美整全博物馆的“整全性”并非指对象规模的扩大或功能的拼凑，而是源于对“整全主体”的重新确立。这是对西方殖民将拉美切割为“他者”，以及工业文明将世界碎片化（专业、功能、学科分离）的双重危机回应。

虽然保罗·弗莱雷本人因巴西军政府的干预未能亲自出席圣地亚哥圆桌会议，但他的思想幽灵——尤其是1968年出版的《被压迫者教育学》——在会议的每一项决议中都清晰可见。当时的国际博协（ICOM）主席于格·德·瓦琳（Hugues de Varine）后来承认，弗莱雷的教育哲学是“新博物馆学”最核心的理论支柱之一。

弗莱雷对传统教育最著名的批判是“银行模式”（Banking Model），即教师是知识的储户，学生是空的容器。将这一批判平移至博物馆学领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博物馆的病理：策展人（压迫者/主体）拥有对历史和文化的解释权；藏品（知识/货币）被陈列在玻璃柜中；观众（被压迫者/客体）被动地接受单一的叙事，除了崇拜之外别无他法。这种模式强化了“沉默文化”，使民众相信自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仅存在于博物馆的高墙之内。

而整全博物馆则对应弗莱雷的“提问式教育”。博物馆不再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提出问题。它将社区的现实（贫穷、土地纠纷、技术匮乏）作为生成性主题，通过文物和展览引发社区的讨论与反思。在这里，观众变成了行动者，博物馆变成了“广场”（forum）而非“圣殿”（temple）。弗莱雷认为，真正的解放只能通过对话（dialogue）来实现，对话要求爱、谦卑、信念和希望。具体到实践中，这意味着策展权的下放。如果博物馆要成为解放的工具，它就不能仅仅展示精英的文化，而必须让社区参与到“命名世界”（naming the world）的过程中。社区博物馆中的口述历史工作坊、由村民自己撰写的展标、以及对日常物品（如农具、纺织机）的神圣化，都是弗莱雷“对话行动”的博物馆学实践。这种

实践的最终目的是“意识化”：即个体通过对自身处境的批判性反思，认识到社会结构并非自然给定，而是可以被改变的。当一个瓦哈卡的农民在博物馆中看到自己祖先反抗压迫的历史，或者看到自己的纺织技艺被作为艺术珍品展示时，他/她便经历了一个“再人化”（re-humanization）的过程，从而获得改变现实的动力。

从这一角度看，整全博物馆的“整全性”深刻延续了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所讨论的“整全的人”（ein totaler Mensch）这一思想线索。其所指向的“整全主体”并不预设一个先验完成的主体形态，而是指向一种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知行统一结构。也因此，整全性并非一种可被提前占有的存量，而是一种在关系与实践生成的状态或者说一种行动理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整全并不等同于综合或统合，而是一种持续被生产出来的关系状态。

5 结语

从1972年圣地亚哥圆桌会议的激进宣言，到消隐与社区的博物馆之家，拉丁美洲的整全博物馆运动向我们揭示了：博物馆学的真正革命，不在于更新陈列的技术，而在于重塑权力的地形。当博物馆开始关注一滴水的流向、一件农具的改良或一段被抹去的口述史时，它便不再是欧洲中心主义叙事的附庸，而是成为了弗莱雷式的“意识化”熔炉。

最终，整全博物馆的遗产并非一套凝固的制度范式，而是一份关于“可能性”的政治邀请——它邀请每一个被客体化的“他者”重新进入历史，在对现实的批判性介入中，将博物馆转化为一种旨在恢复人的全面本质、反抗异化逻辑的永恒行动。

参考文献

- [1] Karin Weil G., Bárbara Elmúdesi K., and Javiera Errázuriz C. *Museos Integrales, Experiencias Y Recomendaciones*. [M]. Valdivia, Chile: Universidad Austral de Chile, 2019.
- [2] MESA REDONDA DE SANTIAGO DE CHILE [EB]. (1972). <https://www.museoschile.gob.cl/mesa-redonda-de-santiago/la-mesa-redonda-de-santiago-1972>.
- [3] Leticia Pérez Castellanos. *La Casa del Museo: un proyecto museal extramuros en los albores de la crítica decolonial* [J]. *Museum International*, 2023: 36-47.
- [4] Glauber De Lima. *Aspiraciones progresistas, dispositivos conservadores: multiculturalismo, nueva museología y Paulo Freire* [J]. *Commons*, 2020, 9(2): 159-185.